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逻辑

于丽艳, 陈 俭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发展之伟大创造,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其历史逻辑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现代化奋斗的历史选择之中,理论逻辑蕴涵在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承继和发展以及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之中,实践逻辑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变革社会的伟大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中。该道路将三者统一于自身,使其既有内在机理,亦不乏“文明经络”,从而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5-0052-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5.007

The Generating Logic of the New Road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YU Li-yan, CHEN Jian

(School of Marxism,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road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great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ven human development, which has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Its historical logic is formed in the historical choice of the CPC leading the people to continue the modernization struggle, and its theoretical logic is contained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modernization thought and the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eory, while its practical logic is embodi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CPC leading the people to change the society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s road unifies the above three within itself, showing both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the “civilized meridians”, thus opening up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the new road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不仅客观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事迹及伟大成就,还适时确立了继续

开拓进取、求强立世的现代化道路的遵循和方向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世界道义问题与民族利益问题集于一体,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JSZM2021035)

作者简介:于丽艳(1997—),女,山西汾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陈俭(1971—),男,河南罗山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

一般与特殊的逻辑统一,开辟了人类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刻研究和梳理这一道路的生成逻辑,是理解这一道路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把握和理解其内涵及独特优势的基础,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强国征程上倍道而进,并以此为基础开创有利于加快世界融合、突显人类道义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将中华优秀文明理念推向国际,将人类解放及其发展推向更高层面。

一、历史逻辑:党领导人民接续现代化奋斗的历史选择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走向了救亡图存的斗争之中,并开启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然而,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虽有仁人志士试图以学习西方现代化成果来拯救中国,但皆未能成功。而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同时带领我国走上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探索之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工业化”为现代化目标的设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在进行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的同时,认识到“工业化”对民族独立、政局稳定以及国家建设等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工业化”为现代化目标的设想。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将“工业化”作为中国未来的建设任务,认为“在将来向前发展过程中,它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1];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工业化”之于民族独立、政局稳定的重要所在,于是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2];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的现代化构想。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初步提出“工业化”构想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关于“工业化”建设的一些基本思路,诸如正确处理工业和

农业的关系、确立国营工业的领导地位、利用外资重点发展工业等。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和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由“工业化”转向“四个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在“站起来”的道路上继续奋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全新的实践课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此,党深刻分析我国国情,不但提出并带领人民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开始将“工业化”纳入现代化的整体视阈,实现了从单一“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的转变。1954年,毛泽东在党的一大会期间提出了要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的现代化构想;1957年,他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化应当同时把握和具备工业、农业以及文化这三个方面的现代性;之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时提出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几经调整和更改,最终于1964年由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公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6],并成为这一阶段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此外,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制定了“两步走”战略,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党接续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此时期解决贫困问题成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立足国情,

明确指出要继续搞现代化,于是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构想,并进一步指明“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突出“小康”。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7]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以“小康”一词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小康之家’。”^[8]可见,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水平,并明确了其实质内涵就是“小康”。为实现现代化,邓小平于1984年提出先达到小康水平、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两步走”战略,又于1987年再度细化,提出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达到小康水平、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1997年,在“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将要完成时,江泽民以第三步目标为基础进行再度规划,提出了以21世纪前50年为时间跨度的新“三步走”战略,强调要先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后,胡锦涛提出以建党百年、建国百年为时间节点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明确要“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将“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建设”调整为“建成”,使这一目标更加突出。这一时期,党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现代化的总体指导思想,带领人民朝着“小康”而努力,开辟了以“富起来”为现代化指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理论准备。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坚持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小康”如期完成,“富起来”的阶段性使命顺利达成,“强起来”的新使命提上日程。为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接续走好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系统绘制

实现强国的发展蓝图,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时期,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使得这一道路的价值不断走向丰富:其一,党坚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治理等,超越了民族价值导向,使得这一道路更具世界意义;其二,党坚持推进新的现代化治理方向,主张关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了“五个现代化”的历史性提升;其三,党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现代化理念,实现了“五位一体”发展布局的历史性提升;其四,党在关注人的现代化及其全面发展的同时,接纳当代世界仍是“资”与“社”并存的实际,主张坚持构建与世界各国一道走向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新”的“共同体”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五,党提出的新时代“两步走”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基础上突出强调了“美丽”的新概念,还历史性地将之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任务提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以“强起来”为现代化指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以往时期的道路模式,不仅强调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还强调了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实现世界和谐共生等方面应积极发挥国际作用,这是党在新时代强国征程上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二、理论逻辑: 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承继和发展以及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和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世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前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无疑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后者作为“西方模式”的核心内容,虽与中国社会性质相左,但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教训或理论借鉴,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孕育的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式,完全实现了对“西方道路”的批判与超越,成为一种崭新的现代化模式。

(一)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承继和发展

在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不仅推动着现代化的走向,而且也对现代化问题进行着哲学性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可以说是世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见证者以及先行参与者,诸如“现代工业”“现代国家政权”等这些与“现代化”相互关联的词,大量出现在他们的联合著作《共产党宣言》之中,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大工业以孕育现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人走向现代社会提供了现实契机,而这一现代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9]405},存在使各个民族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同时也引起了这个现代社会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的产生,存在走向社会主义新形式的历史必然。他们二人还以思辨性的现实视角审视了落后国家过渡现代社会的历史问题,指出落后国家虽有被殖民的命运,但殖民主义却能以“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9]854}刺激这些国家的进步意识,从而取得民族解放与独立也就必然成为它们走向现代社会的先决条件。除此,他们二人还将这个历史问题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相关联,从理论层面预见了一些国家存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

进入20世纪后,在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列宁、斯大林发展并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理论设想。列宁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第一次提出了赶超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认为这一道路必须与苏俄实际相结合,也必须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10],然后牢牢打下“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11],也就是要有充分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高效的社会生产效率。斯大林承继和发展了列宁的现代化思想,首次实践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苏联模式”,虽然这一模式最终未能长久存在,但其对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

行现代化探索存有可取之处,诸如重视工业化、重视社会制度的巩固等;而且也留下了可供后人参考的理论启示,诸如政治、经济、民生三者良性互动和开放包容等;同时,它也足以向世界表明,“资”姓道路并非世界现代化的唯一之路。

长期以来,党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继承其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并将其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紧密结合、高度融合,不仅生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成果,还在中华民族从“富”到“强”的新时代新征程上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向世界表明了后发国家依靠自身的优势和努力也可以走出一条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基础。

(二)理论借鉴: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坏瓦解,一批新兴的国家走向独立并触发了这些国家如何谋求发展的时代“热点”,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围绕“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如此,西方现代化理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就这样必然产生了。就实质含义而言,西方现代化理论主要涵括西化论、工业化论、过程论、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论五类观点。其中,T·帕森斯、W·罗斯托等主张西化论,认为“现代化=西化”,后发国家“必须借助西方文明的传播,西方化是其实实现现代化的启动力量”^[12];M·T·列维、穆尔等主张工业化论,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化”,片面地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终点;英格尔斯等支持过程论,认为现代化是自科技革命以来的社会变动过程,试图以特定的现代化指标对其加以衡量;弗兰克等支持依附论,认为在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资本主义发展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关系模式支配了低度发展国家的中心都市”^[13],非西方国家必须打破依附链条才能实

现现代化;沃勒斯坦等认同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并处在“中心—边缘—半边缘”的等级结构之中,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要永远受世界体系制约。

不可否认,西方现代化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其理论本身确实存在一些合理内核,诸如倡导自主实践、追求工业发展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西方现代化理论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现代化的后来者对其在诸多认识上存在较大偏差,而且此理论在实践上也难以适合“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此理论依据于社会进化论,从哲学上对抗革命论,也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相违抗;此理论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动力问题归因于国家内部,把西方国家的扩张“抬高”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福音”……最主要的是,此理论中拥有强烈的“西方中心”意识,意图从根本上抹杀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这就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对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并在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对其实现超越。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从根本上是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与生俱来的民族侵略意识和扩张本性,使其成为并非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当然,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本身存在积极的一面,但“积极”并非等同于“进步”,它所倡导的以“资本”主导世界的一贯原则,势必带给世界不可遏制的战争、犯罪、贫穷与社会撕裂等现代化痼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其实,这“未来的景象”真正昭示的是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关系给后发国家带来的一种现代的灾难的未来。因此,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批判这种带有“未来的景象”的现代化理论并实现对它的理论超越。

显然,在这种世界历史的时代背景下,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在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合理之处的同时借鉴其合理之处而真正实现了对其的时代超越,这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其一,它超越了西方“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遵循“人民主体”,是致力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现代化;其二,它超越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密切结合,是致力于推进“五个文明”综合发展的现代化;其三,它超越了西方“国强必霸”的丛林思维,坚持独立自主,是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四,它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固化思维,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理念,是致力于造福世界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的时代超越,坚持守正创新,历史性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实践逻辑:党领导人民变革社会的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的百年实践,亦是其变革中国社会的实践过程;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连续文明的古国之创造,亦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实践密不可分。因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逻辑需从党领导人民变革社会的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寻求根源。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变革社会的实践之路

党自建立以来,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积极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变革,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开创的,是变革社会的伟大实践之路。

首先,党领导人民驱除现代化阻力。工业革命后,世界逐渐被卷入现代化的发展大潮,世界现代化的初起,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与掠夺,也伴随着落后国家的被侵略与妥协,一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斗争在这场现代化浪潮中愈演愈烈,而曾经拥有人类辉煌成就的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沦为“鱼肉”,处处受制于西方列强的霸权与强权。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战争不断,因此缺乏稳定的政治前提,再加之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及

人才、技术、资金的缺乏等,现代化进程艰难而缓慢。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起,就肩负着领导人民探索和建设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而如何驱除那些现代化的阻力就必然成为其首先面临的实践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在稳定的国家政权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贫穷落后的国内现状,党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来建设社会主义,带领人民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我国得以确立,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有了坚定的政治方向和独立的经济基础,自此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方骖并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现代化稳步推进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很大的发展阻力,诸如人才教育问题、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对此,党中央深刻分析现代化发展的国内外实际,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富带后富”等诸多举措,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当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以及在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开创了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发展、变革现代社会的道路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事实上,党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步步驱除现代化阻力的过程。

其次,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和变迁。党自创立以来,领导人民探索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与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和变迁密切关联。就宏观而言,在党领导人民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形态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

历史性转变,现到达了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的初级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目标,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实,就微观而言,我国社会形态的内部变迁从未停止过,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直在努力,从党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全面小康”,我国已然积累起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曾言,量变是质变的必然准备,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何尝不是社会向更高形态迈进的过程呢?就一定程度而言,这一过程即是社会主义形态内部变迁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党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其领导人民实现社会形态转变和变迁的过程。然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还未完成,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仍在路上,因此仍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断深入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之路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续性的文明”^[15],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因动荡而湮没,而是走向不断丰富和发展,熔铸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血液之中,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文明根性。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而极具“文明经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因以这一实践为基石得以在当代社会完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者皆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价值趋向。也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文明新路作为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新时代成果,统一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转换,统一于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性飞跃,并朝着“五个文明”综合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方向大踏步奋进。

诚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伟大创造之成果,是党在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吸收世界其他先进文明中开创的

当代之路,它的开创使得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在新时代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6]。它内在地要求以宽广的胸襟接纳全球化与“世界大变局”,力图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并主张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由此实现了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传统社会理念向为人类作贡献、为世界谋发展等内涵丰富的“天下观”的新时代转化,显示出强大的时代号召力;同时,它内在地要求坚持以“以人民为中心”、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剥离出传统民本思想现代性的本真价值”^[17],由此实现了从“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理念向“人民导向”“人民目标”“人民立场”等“人民观”的新时代转换,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

值得注意的是,古往今来,我国社会的发展一向关注“人”及其价值理想问题,强调人的发展对于民族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现实意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在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力求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动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实现,它关注的是中国 14 亿多人口的现代化以及共同富裕;而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选择,是党在考量当前国内外发展实际基础上的伟大创造,这一道路在以民族为导向的同时也显示出超越民族界限的优越性,诸如,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关注了“世界怎么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这不仅彰显出中国对“整个世界”或“整个人类”发展的密切关注,也为“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提供了一种中国方案。简单而言,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人”及其价值理想的关注,同时又将“现代人”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和考量,在新时代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真正将全人类的幸福作为重要的价值指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中国要做推动人类

发展进步和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要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共同推动历史的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新时代,党在领导人民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提出的生态治理、全球人权治理等诸多科学理念,无不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现代化实践的融合发展。总之,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在地要求运用文化智慧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化的实践问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之路。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集历史、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逻辑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接续现代化奋斗的历史选择,并在历史之中得到了发展;而实践是历史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变革社会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探索而成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理论作为实践的先导,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以及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积极成分无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新时代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深刻把握其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89.
- [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6-147.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 [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3.

(下转第 108 页)

式来实现保护地役权的环境保护功能。

四、结语

将保护地役权制度广泛运用到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当中,能够同时兼顾国家公园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可有效化解人地矛盾冲突,丰富土地利用方式,进而降低国家公园的管理成本。未来,针对国家公园保护地役权的制度设计,可主要从权利主体、客体、内容以及运行等多个方面加以统筹考量。同时,为推进保护地役权制度的有效实施,可通过健全生态补偿、财税激励、公众参与、信息公开以及司法救济等配套机制为之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总之,应考虑在相关立法中对保护地役权制度予以确立,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参考文献:

- [1] 胡锋,白洋.我国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衔接研究[J].世界林业研究,2020,33(5):89-93.
- [2] 焦琰.我国保护役权的构建研究:基于环境保护与财产权限制方式的探讨[J].北方法学,2018,12(3):147-160.
- [3] 方言,吴静.中国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与人地关系研究[J].旅游科学,2017,31(3):14-23.
- [4] 魏钰,何思源,雷光春,等.保护地役权对中

国国家公园统一管理的启示:基于美国经验[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1):70-79.

- [5] 王婷宇,李一丁.功能分区视域下国家公园集体土地管制的优化[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4(4):111-118.
- [6] 潘佳.管制性征收还是保护地役权:国家公园立法的制度选择[J].行政法学研究,2021(2):76-84.
- [7] 窦亚权,李娅.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现状及发展理念探析[J].世界林业研究,2018,31(1):75-80.
- [8] 张力.公共地役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制度构建[J].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18,18(2):3-13.
- [9] 秦天宝.论国家公园国有土地占主体地位的实现路径:以地役权为核心的考察[J].现代法学,2019,41(3):55-68.
- [10] 辛巧巧.自然保护地保护的役权路径及其法律规范[J].广西社会科学,2020(7):117-122.
- [11] 胡锋.国家公园土地流转保护地役权路径的证成与规制[J].前沿,2022(5):67-76.
- [12] 张晏.国家公园内保护地役权的设立和实现:美国保护地役权制度的经验和借鉴[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9(3):18-25.

(责任编辑:冯兆娜)

(上接第 58 页)

- [7] 邓小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96.
-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2.
- [11]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
- [12] 马崇明.国内外现代化理论评述与标准研究[J].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4):1-7.

- [13]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达[M].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4:15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 [1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494.
- [16] 陈曙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92-102.
- [17] 吴海江,徐伟轩.“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7):38-44.

(责任编辑:李秀荣)